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中国政治）

民国时期的土匪

04

原著： [英] 贝思飞

译者： 徐有威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九章 “平均主义还是尽义务？”土匪和革命运动

匪徒总是英雄、捍卫者、人民的复仇者，无论在民事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他们是整个国家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对抗权势、贵族、官吏和僧侣文明的殊死的斗士。

迈克尔·巴枯宁，引自弗兰科·文图里《革命的根源：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纽约，1966年）369页

土匪是流氓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具有各种日积月累的习性。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他们只能被当作一种辅助力量。

《中央通讯》（1928年7月3日）引自帕克·海厄博姆《中国共产党文件1927—1930》（香港1971年）400—401页

半个世纪以来，革命的浪潮在中华大地上此起彼伏，影响着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土匪也不例外。这场革命运动是由知讽分子领导的，他们对土匪的态度与昔日的争权者没有什么区别。很多年来，城市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环境，而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村只不过是些后补地区。象匪帮和秘密社团那样非正规的力量都是辅助性的，只有当工人、士兵和学生这些更有革命性的力量缺乏时才可以依靠他们。而且既然是辅助性的，这些力量往往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

换句话说，土匪是与革命武装格格不入的。一种革命力量的发展绝对需要团结一致的组织，土匪是为了生存才走到一起的，而任何有理性的长期组织部不得不吸收各种外来者一起工作。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革命者开始意识到这种取舍的需要，为了一个更好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的所有行动都是源于一种策略。然而，土匪对他们所知道的世界抱有更高的期望，他们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组织和行动起来。因此，土匪并不一定要参加运动，不论革命运动是否给穷人带来希望。共和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多次企图接纳土匪参加革命，但他们从未真正认识土匪的本质，而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在老匪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时，却缓慢而又痛苦地吸取了这个教训。

虽然主要的匪帮似乎凭借自己的实力就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有时给他们派去一些政治顾问以使他们走上正规，但是认为在实际上可以学习和采取土匪的策略和战术，同时通过运用游击战原则来去除土匪行为中较有破坏性的那些方面，就必须等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到来。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共产党最终设法创造出足够的力量，把土匪一路扫除干净，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共产党也有足够的力量把那些继续顽抗的匪徒消灭。和过去一样，这样的事情通常是必然的，如果你自己不能处理有关土匪的问题，那么别人就会去处理，结果对你就不大有利。所以，直到1949年解放，处理土匪问题都是革命策略中的当务之急。

对土匪本身来说，共和革命者和后来的共产党人的出现往往不过是在现存的倾向于江湖豪杰的关系模式上增加了一种新的复杂因素。视角及其见识广度上的基本差别使得土匪和革命者成为不可靠的合作者，不管他们在短时间年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便利常常能够战胜怀疑。不断增加的混乱和不安定使土匪越来越多，加剧了争夺强有力的保护人的斗争。当革命者能够比其他人提供更好的前途时，土匪与革命者结成至少是暂时的联盟就没有什么不寻常。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得到一种新的视野，有些人却保持他们的传统

看法。无论如何，对于土匪本身以及对于那些不得不去应付土匪的人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匪被革命进程所忽视或遗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革命后”是另一个概念，它对土匪和革命者来说是不同的。对普通百姓而言，新的“革命”政府宣布统治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恶霸仍然是恶霸，捐税照样征收。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通过土地改革消灭了最引人注目社会不公，清除了敌对的军事力量，并且驱逐了外来影响——但是新政府发觉，在那些以掠夺自助的传统地区，土匪活动仍然是针对自然灾害和政策不公的本能的反应。

作为革命者的土匪

当反动势力迫使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从都市转移到农村时，他们开始寻求新的联盟作为他们斗争事业的补充力量。对这些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来说，其任务就是“打破陈腐的清规戒律”，把当地百姓的冤苦和积愤转变为一种全面的紧迫的复仇意识。但是在实践中，改变整个农民阶层的现状是相当困难的，农村社会的一贯行为是避开或欺骗陌生人。结果，革命者显然不可能不被匪帮和秘密社团的革命潜力所吸引，他们的反抗是那么惹人注目，远远高于“芸芸众生”。农民社会作为整体具有消极和猜疑的特性，相比之下，土匪和秘密社团的英雄气概似乎是相当适合20世纪初期盲动主义革命者的正统理论。这种期望可能随着那些江湖豪杰的武侠传统和充满乡土气息的好汉故事而提高。因此，这种地方力量带着它们的一切缺点，作为20世纪前半叶革命力量的一个来源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吸引力，并且得到一大批激进的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的称颂。

对于土匪的革命潜能，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对它备加赞赏，他认为土匪是“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他们没有花言巧语，不咬文嚼字；不妥协、不疲倦，不屈服，他们是大众和社会的革命者，他们不具有政治性，独立于任何团体。”总之，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张的革命最初起源于破坏性的冲动，然后自然转为创造性的推动。通过运用土匪这种现存的“造反力量”，不仅可以动员起这种破坏性的热情，而且可以联合起来，投入到“酝酿已久的无情的大众革命”中去。一场真正的革命首先要求分散政治的控制，因此也允许适当利用土匪的良好倾向，正如本章开头所概括的那样。

不幸的是，正如前几章所论及的，巴枯宁所描述的土匪的那种“不妥协”、“独立于任何团体”的特征往往与事实相去甚远，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不可能存在的想象。作为贵族，巴枯宁很难与土匪进行直接接触，这种看法从总体上反映了他偏爱暴力革命，倾向于浪漫的理想主义。同时，对巴枯宁把土匪理想化的许多指责打开了理性化的大门，随着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占了优势，欧洲革命运动的自发性随之消失。对巴枯宁来说，这似乎表明“革命者”本身已经成为失败的事业，于是土匪成为“扭转乾坤”的唯一存在的力量源泉。

尽管毛泽东所处的背景截然不同，但是在许多方面他与巴枯宁的特征有相似之处，事实上，在1918年的好几个月中他被苏俄革命所吸引。他对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使命也感到厌倦，它使那些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者看不到农村所存在的革命潜力，尤其是那里现存的“造反力量”。毛泽东坚决指出，只要有决心，任何农村中的游民都能改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正如巴枯宁那样，毛泽东在革命运动中认识到，不能把土匪仅仅当作一种破坏性力量，而是要指派政治鼓动者去把他们联合并组织起来。例如，在毛泽

东 1926 年的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报告中，他指出“这一批人（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娼妓）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在共产主义运动早期，他接受了土匪和秘密社团的首领的极富同情的援助，而不是象他著作中所描述的出于无奈的援助。当我们谈到《水浒传》是毛泽东年轻时代喜欢的书籍之一以及一直对他具有革命的启发作用时，这并不令人惊讶。例如，有人问他如何解决农村的弊病时，他简明地回答：“要学习梁山泊好汉！”在他的著作《矛盾论》中，他引用了《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宋江来强调他的哲学观点。毛泽东在晚年，承认自己既是农民运动长河中的最后一位领袖，又是绿林大学的一位毕业生，他清楚地说明了土匪传统和中国农民起义的漫长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他共产党领袖也在土匪中发现了积极的品质。朱德是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红军的主要指挥员，他以前是云南省军队的军官。1922 年，他落入四川首领禄国藩之手，禄国藩“确实是个土匪……与军阀相比，他是正直的可尊敬的平民。”另一方面，朱德对于土匪工作的实际经验远远超过巴枯宁，朱德观察到，土匪在失败或在外界压力下撤退时革命潜力是有限的。

贺龙将军是朱德的伙伴，他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谈论土匪说：

虽然他们确实是野蛮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优点：

真诚、精力充沛，精明而讲究实际。如果他们不愿意与你交谈或亲善，他们就不会勉强。一旦他们信任你，那么不管死活他们都不会改变。不管你给他们带来官职还是钱财，都无法收买他们。他们相当勇敢，许多人跟着我而牺牲了自己。土匪在实践中是如何符合革命者对他们的期望的呢？虽然土匪并不是象那些傲慢的、受过都市教育的革命者所认为的是为社会所不齿的没有希望的人，但是也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们往往并不表现为嗜血成性的斗士。共产党人发现，当他们开始向绵延伸展的边缘地区迁移去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时，“土匪”与“革命者”之间的关系要比他们通常想象的更为复杂。虽然有些个别的土匪和革命者有时具有共同的特征，但是他们最终的奋斗目标存在着根本分歧。

土匪活动的发展是对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一种有效反应，但是土匪并不打算把这种状况改变得更好，而革命运动的前提是要彻底改变社会结构本身。土匪活动给予其实践者一种与普通民众不同的身份，这自然是以不平等的社会为基础的，这种身份使得他们拥有某种特权；革命运动立足于为平等而战，它强调革命战士不把自己凌驾于农民之上，他们在面临苦难和危险时从不索取个人的报酬。对许多人来说，土匪活动是一种暂时的职业，是生活的自然周期的一部分，通常他们不会根深地卷入任何政治斗争；然而，投身于革命运动是决定参与一种社会变革的积极工作。土匪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形成对照的现状，它与合法当局的社会平行，不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革命者则要把他们全部的价值观念付诸实现，彻底地改变现状。因此土匪很容易与现行权力结构合作，就和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反对它一样，而革命运动是反对现行权力结构的，至少在原则上如此。

虽然土匪很少唤起他们周围的农民的觉悟，至少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做，但是在一场缺乏理论指导的运动中，对农民来说，土匪活动就几乎相当于政治行动了。土匪活动在传统上往往发展为历史上以顺应“天命”为目的的农民起义的序幕。然而就土匪活动自身而言，它既不是造反，也不是革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当土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不是为了自

我生存就是为了自我改善。土匪活动不包括改变社会的价值观，他们的决定最多只是打破了大多数农民所具有的听天由命的想法。无论唤起怎样的勇气，都无法超越农民的天地：对于穷人来说，他们只要求有足够的粮食维持到来年的收割；对于长期的失业者来说，他们只要求相对稳定的生活；对于无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只要求租上一块田或为别人耕作；对于有雄心的人来说，他们只要求有机会参加军队，在当地的政治圈子占得一席之地。只有在发生饥荒时，只有在“安分守己”地生活无法维持时，只有在土匪首领揭竿而起与造反队伍取得联系时——而且可以看到成功的可能，只有在这时候，才播下了第一批造反的种子。

因此，土匪活动不过是提醒人们，对那些局部地区的混乱状况要格外小心。土匪并不要求改变社会的等级划分；他们只是强调生活在低层的人民遭受虐待的事实。因此当土匪采取行动时，他们的矛头不是对准统治阶级的上层，而是那些直接的压迫者，也就是那些获取高位、滥用职权的人。

总的说来，土匪是复仇者，他们的斗争目标不是对准压制他们的社会制度，而是对准那些滥用这种制度的个人。如果他们需要变革——很少出现这种情况——这只不过是对个人过失的反应。通常，他们并不要求社会有什么变革，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他们（包括同村的乡亲）所遭受的苦难讨还血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土匪产生于农民大众；但是他们没有新观念的帮助，他们的政治视野不会超过本乡本土的范围。因此他们的看法是消极的、狭隘的和排他性的，“这种抽象的仇恨不能成为暴力革命的动机。”他们几乎区分不出各种敌人的差别，甚至连区分敌友也要比想象的更为困难。由于他们的自私自利，他们很容易与那些曾经压迫他们，造成他们饥饿，并且最初引起他们愤怒的军阀和“土豪”同流合污；在政局动荡，天下大乱的局面之下，土匪之间的结盟也会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当他们对压迫者的愤怒化为行动时，往往也是盲目的复杂性的暴力行为。尽管这是农民发泄不满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清理，它只满足复仇的欲望，通常在愤怒平息之后可以发现，遭到屠杀的并不总是那些负有责任的人。

至于象红枪会那样的村社自卫组织，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土匪为了生存而经常骚扰的地区，这些村社组织虽然是用于自卫的，但是由于它们受到地域的限制，基本上也带有保守主义的痕迹。对于现状的不满只能导致土匪活动，即使意识到当局不能够也不愿意提供保护，也只能导致地方的自卫；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对整个社会产生更为广泛的批评。总之，土匪活动，地方自卫以及社会革命形成了社会发展的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虽然地方武装和社会革命对社会都是破坏与毁灭的方法，但是要改变这种方法必须把军事力量提高到更高阶段。

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那些掠夺性的土匪活动和地方自卫混杂、采取相互保护的制度的地区。作为一种经过时间考验，并且能够成功地解决生存问题的合理方法，这个保护制度的实践者竭力反对采用任何新的措施，特别是由局外人带来的措施。所谓的“土匪世界”通常具有一些地理上的优势，比如便于匪帮藏身的崇山峻岭和稠密的森林。对于个人生存来说（总之，这是土匪主要考虑的），这些地区是有利的。然而，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土匪隐藏在群山密林中要征服或削弱敌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种环境往往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就是形成“职业性”土匪或惯匪，这些惯匪如果没有军事的约束，很难纳入有纪律的革命组织。他们可能从土

匪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给养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的首领在地方上拥有相当高的威望，就象他们拥有真正的地方实力一样，这使他们对革命运动的发展抱轻视态度，这种运动可能比他们的影响为小。结果，正如霍夫海因茨所指出的，在传统上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土匪与革命之间的）更为典型的关系是敌对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偶尔为匪”者是因为暂时的因素参加土匪活动的，他们赞成革命就更值得怀疑。根据情况，这些人可以成为匪帮的普通成员，也可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成员。然而，促使他们加入革命队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要革命，而是因为他们要生存。他们和城市的无业游民一样，任何团体只要能够满足他们对于食物和工作的要求，他们就可以供它驱使，他们是非常反复无常的。正如一位职业共产党组织者所总结的，这些人只有在他们的“浪漫和不受约束的本性”以及卤莽的倾向得到限制时，他们才能够投入革命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土匪的黑话中，军事行动被称为是“闹”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土匪参加革命运动有些是出于偶然，有些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革命的形势下，给那些能力很强、精力充沛的人所提供的机会是相当多的。许多以前很可能成为乡村帮派中的成员的年轻人发现了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新的英雄用武之地。对农村的平淡生活感到厌倦的青年人跃跃欲试以证实自己尚未失去的勇敢和激情。在加入实际的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许多人通过宣传教育懂得了参加革命的政治因素。有些人则仅仅满足于竭力效仿旧时武侠的英雄行为，他们把革命运动的目标当作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同时对于那些已经铤而走险的土匪首领来说，特别是那些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首领，成为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他们的许多受压迫的追随者也认为参加革命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 总而言之，土匪的世界并不是革命者的世界。当土匪与革命者相互对视时，总是带有勉强的钦佩和互不信任的感受。从土匪的观点来看，拿起枪杆以武力反对当局的革命者表现了一种大丈夫气概，尤其是在他们选择在农村渡过艰难困苦的生活时。例如，在政府清剿之后紧接着开展秘密活动的革命者很容易赢得土匪的尊重和支持。被政府“悬赏的头颅”可以成为一种凝聚力，它证明革命者所仇视的正是威胁土匪自己生命的当权者。另一方面，革命者显然是外来者，他们身上往往带有中产阶级的习惯，他们试图占据支配地位的倾向往往令人讨厌。

据我猜测，从革命者的观点来看，土匪那种大丈夫式的生活方式也能引起充满浪漫情调的敬佩，尤其对于那些普通的革命者。同时，土匪首领往往受过教育，富有才智，因此也能够把他们的思想转变到社会变革的方向来。由于土匪通常是以剥夺富人的财产为生的，即使他们的最终目标含糊不清，他们行动的基本方向是可以接受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土匪的藏身之处，因此，“土匪活动”和“革命行动”之间的差别就很难区分。

贺龙在红军队伍中最初几个月的生活说明了土匪活动与革命理想之间的差别。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不象个共产党员。”在他周围有一大帮私人顾问，他喜欢乘坐四人大轿，有自己的厨师为他准备中西食品。他和他的军官与共产党军官相处不好也并不奇怪，即使在他加入共产党的前夕，他与他的部下还是被称作共产党高级将领中的“土匪”。由于他的缺点被认为是危险的，共产党的宣传干部不断对他进行教育，以确保他对革命的忠诚。（11）

不过，土匪最终并不一定会加入革命运动或对它保持忠诚，不论它的规

模如何。正如过去华南的土匪首领拒绝参加初期的太平天国起义，因为“太平军力量不强，难以成事”，在白朗起义时，有三个地方的土匪首领组织起来支持袁世凯。同样在1928年，井岗山的土匪首领决定与红军联合主要是由于红军通过上层组织力量垄断了“土匪的环境”，而不是因为任何即刻的转化；而且土匪首领的联盟是相当短暂的。（12）“权势”是绝对不错的东西，许多土匪试图摆脱农民社会的局限，而确定建立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他们不愿意加入纪律严明的革命运动而失去已经拥有的自主权，他们情愿选择较为省心省力而且似乎又有较多报酬的出路而充当反动势力的“爪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土匪在“剿匪”的名义下以骇人听闻的热情镇压那些威胁他们新地位的人——尤其是革命者。对革命者来说，这种情况要比土匪的目光短浅，组织散漫更有危害性。

土匪与革命，1911—1928年

1911年11月，同盟会的三位年轻军人悄悄地从开封抵达洛阳，

同盟会已做出决策，寻求联合当地民众的力量，以便发动反对满清王朝统治的起义活动。他们的任务是联系“河南盗王”王天纵，把他的“大刀会”战士拉入革命队伍。

王天纵的队伍是典型的职业匪帮。1907年，也就是我们将叙述的事件发生的前四年，一群以英雄自称的、以“十大结拜兄弟”而知名的土匪聚集于豫西嵩山县的嵩山山麓的羊山峰顶。他们都很年轻、受过教育，而且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是在“复仇中犯下罪行”而逃往山里以逃避惩罚的。他们歃血为盟，结成兄弟。

开始保护自己的地盘免受外来“匪帮”的掠夺（宋老年在1908年曾扫荡这个地区）。他们很快把影响扩大到豫西诸县。他们组织严密、兵强马壮，甚至在1911年以前就击溃了清军想把他们从山寨中赶走的一系列进攻。

（13）

1911年被派往这支非正规队伍的两名代表是吴沧洲和刘春仁，他们的任务是与这支匪帮取得直接的联系；第三位代表是刘镇华，他交给吴沧洲和刘春仁一封写给他的朋友、恩人和老师石又骞（石言）的介绍信。石又骞不仅是孙中山的热心支持者和革命的拥护者，而且是一位接近当地匪酋而且显然受到他们尊敬的人，包括羊山的匪酋。他能够提供有关羊山当时情况的详细的秘密情报（包括那年夏天王天纵杀死关老九，又与憨玉琨发生派系冲突的情况），也知道如何上山，以及如何用行话去接近匪酋。特别是他提醒他们学习土匪的“黑话”。因此两位激进青年做了大量的准备，携带官方的证明，作为开封官吏去羊山调查土匪问题，同时带着石又骞的介绍信，开始执行他们的使命。

尽管在他们登上羊山的途中遇到严格的安全检查，但是只要提到石又骞的名字并出示介绍信，就会受到由衷的欢迎。他们碰到的第一个匪酋是王天纵本人。刘春仁立刻向他说明共和派联合他的人马是为了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他补充说，如果革命成功，“我们希望你会同意出任河南省长。”王天纵非常高兴，立刻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匪酋，于是刘春仁对他们作了演讲，述说了满清王朝的罪恶历史，贪官污吏对百姓的欺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以及武昌起义的胜利。接着，刘春仁向所有匪酋说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据说众匪酋在刘春仁滔滔不绝的独白时一言不发；只是在他说到联合各路人马攻取洛阳，宣布河南脱离清廷，使百姓安居乐业时，才激发起他们的热情。

当晚摆上了丰盛的宴席，有猪肉、羊肉、鸡、鸭和其他美味，说明王天纵和他的队伍在山寨里过得非常不错。吴沧洲和刘春仁各分别坐在一张大桌子的首端，桌子两侧坐着匪帮的主要首领。酒足饭饱之后，吴沧洲记起石又骧曾告知如何弥合匪帮中的分歧，于是他单独提起关老九，并且备加赞扬，直到憨玉琨起身把他带去会见关老九 60 高龄的老母，关母现在在匪帮中被尊作长者。关母给半醉半醒的吴沧洲倒了一杯糖水醒酒，然后对他说：“你看上去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是什么让你来到羊山的？”接着她告诉吴沧洲，众匪酋如何讨还血债，诛杀贪官而逃入深山，她力劝他不要重蹈覆辙，“要好好读书，走一条应该走的路！”吴沧洲恭敬地行了叩头礼，回答说：

我 13 岁丧母，14 岁丧父，17 岁流落街头。听说羊山的朋友立誓伸张正义，我特地慕名前来拜谒。我想和你们一起参加革命，打倒贪官污吏，替天行道。

第二天，王天纵召集 800 名弟兄，请吴沧洲和刘春仁再次讲话，然后检阅队伍和武器，他们的武器主要是从当地士兵手中买来的。检阅之后又是宴席，这次历有的匪徒都参加了。宴会结束时，憨玉琨和另一个匪酋张治公又带着吴沧洲去见关母，在她面前献血为盟，结为弟兄。在象征战神的关帝和其他木雕的偶像前，关母告诉他们三人：“这是我们家族的祖先，他们也在结义之后成为兄弟。现在你们在关帝面前起誓，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吴沧洲伸出手，指着憨玉琨和张治公答道：“这两位如同你自己的儿子，请你也接受我做你的儿子，请接受我对你的敬意。”关母微笑着说：“现在你们三兄弟点上几柱香。”憨玉琨和张治公立即点上蜡烛和香，烧上几张黄表（用来祈求先帝，承认新入伙的成员），随后杀了一只鸡，将鸡冠里的血滴入酒碗中，他们首先在关帝像前行了传统的“三跪九叩”之礼；然后转向关母行鞠躬礼，起誓结为兄弟；最后，按仪式要求，三位同饮一碗象征他们结义的混入鸡血的酒。那时憨玉琨 24 岁，吴沧洲 25 岁，张治公 20 岁。仪式结束后，关母赠送给吴沧洲一支她儿子留下的珍贵的白朗宁手枪。

综上所述，共和派和以后的革命者一样，在同土匪和其他民间力量结盟时都面临三大问题。首先是用违法者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吴沧洲把自己说成是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好汉，石又骧又劝说他学习土匪的“黑话”。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土匪的赏识，这就意味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土匪的生活中去。因此他们不得不卷入一些当地的事务，诸如打倒地方官吏，拒绝交纳地租，甚至参加绑架富豪的“土匪”活动。革命者也必须表现出个人的正直坦诚，共同承担土匪生活中的危险，而且常常还要象在羊山一样，参加敌血为盟的传统仪式，这是令人乏味的。

革命者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克服土匪的地方倾向。羊山的匪帮认为攻取洛阳就达到革命的目的了，他们对刘春仁演讲的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兴趣。克服这个问题的困难使共和派产生了把地方力量看作无足轻重的倾向。

第三个问题是保持作为革命者的思想意识的可靠性，不能因为与土匪交往而受到污染。例如，刘镇华由于在 1911 年和地方武装打过交道，后来又控制以土匪改编的镇嵩军，直到 20 年代还被称为“嵩山匪酋”或“白狼的爪牙”。

（14）

土匪和革命者之间的这种联合既有益处，又有弊端。一方面，象土匪那样底层社会的团体对革命运动初级阶段和防御阶段的隐蔽活动，无论在策略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有所准备，许多联盟都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

方面，除非这种联盟能够谋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以扩大它所控制的社会基础，否则它就注定永远被政府视为纯粹的“土匪活动”，永远也不能巩固它的政治权威。

1911 年最后几个月是令人兴奋的，中国各地的匪酋和共和派之间举行了类似前面所描述的献血结盟的仪式。（15）尽管要弥合两者在社会上和思想上的鸿沟是很困难的，但是共和派为了完成他们所不及的事业迫切需要寻求同盟者，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把注意力转向土匪和秘密社团，特别是在那些军力不足或者尚未取胜的地方。在华北，绝大多数军队忠于袁世凯，秘密社团的力量与南方相比要弱小得多，革命者接近土匪显得更为急迫。

1907 年春天，这种新战略在东北的第一次成果是策划当地的红胡子占领奉天，以分散北京对南方起义的计划的注意力。这个计划的策划者是宋教仁，他长期以来就主张吸收红胡子参加革命。与许多“进步人士”不同，宋教仁对《水浒传》和其他一些武侠小说所描述的英雄好汉持有肯定的看法，他认为红胡子和那些英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早在 1905 年，他就写了一篇题为《20 世纪的梁山泊》的短文，对东北的武装社团深表同情；1907 年，他决心努力取得他们的斗争经验，以发动反对满清政府的起义。他建议匪酋在靠海的简道地区的活动最初十分成功。宋教仁在写给他们的信中谨慎地赞扬红胡子反抗清朝专制的传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种反抗会逐渐消弱，仅仅成为一般的违法活动而已。信中还以建议的口吻指出，土匪和革命者之间的联合是平等的，革命者的任务是提供指导和援助，以确保起义的胜利。但是在起义的那天，计划被泄漏了。匪酋没有完成招募各路土匪的任务，起义遂告失败。宋教仁本人被迫逃往日本人控制的大连。（16）

尽管起义失败，尽管红胡子总的说来在共和派中间仍然不被信任，但是联系一直保持着。另一位革命领袖黄兴在 1910 年 5 月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提到，几年前，一位日本浪人萱野长知曾率领一支由东北马贼和黄海海盗组成的队伍到日本去见他，目的在于利用这些人牵制清军在华北的行动。1911 年军官吴禄贞也为了相同的目的与南满匪帮进行联系，（17）虽然有效的联合从未实现过。

据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声称，河南长期的造反传统和明显的社会矛盾创造了“革命的客观条件”。另外，河南是通向北京的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就使它在 1911 年自然成为共和派所关注的对象。早在 1907 年春天，他们就决定暂时从四个方面去动员那些最可能接受革命鼓动的团体：军队、学生、地方秘密社团（“仁义会”）和土匪。无论哪个方面成功，都可以在革命后由他们推出新省长。有些团体，比如羊山的土匪，由共和派专员联络，并且说服他们参加起义；其他团体则自发地行动起来。（18）革命者的态度的转变，其标志是共和派的喉舌如《民立报》对土匪称谓的突然改变，《民立报》一度称他们为“盗匪”，现在正式称为“健儿”。（19）然而，即使没有上述的政治因素，1902 年至 1911 年期间一连串的地方骚乱为标志的农村暴动的增多使河南的情况变得独一无二，迫使共和派关注非正规武装，因为即使在 1911 年没有爆发革命，也没有迹象表明使用武力的倾向会缓解。

革命者主要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三条路线上，东路动员“仁义会”，去占领黄河流域；南路的目标在于争取宝丰、鲁山和郟县的农民土匪；西路是最有希望的，他们打算让羊山的土匪和洛阳附近的一个秘密社团“在园会”

结盟，目标在于为革命保卫洛阳。结果也确是西路的力量在河南农村为革命作出了最大贡献；由于革命者的鼓动，几乎所有的主要匪酋都支持革命。（20）

到1911年底，王天纵和其他匪帮被共和派改编，重新组成河南民军。在设法杀死嵩县县长之后，他们和“在园会”一起动员了一至两万豫西农民，率领他们进攻洛阳。当地的农民匪帮也通过骚扰追赶政府军来帮助民军。由于遭到意外的抵抗，攻城失败，在向西撤到陕西之前，民军还打了几场持久战。在陕豫两省交界处，他们遇到并加入另一支相似的非正规部队，即陕西民军，这支部队由另一位河南人统率，他叫张钊（又称张培英）。从那时起，到革命党人宣布和清王朝和平谈判期间，“陕豫联军”继续留在两省边界的几个县里，他们几次与官兵发生冲突，并且生存下来，得到当地百姓的坚决支持。（21）

然而，尽管河南许多孤立的匪帮已经联合起来，尽管他们比起河南民军更为英勇善战，但是原计划中对共和派武装和各民众武装的集中指挥却从来也没有实现。后者常常只是依靠殊死的勇气 and 热情，而前者没有任何组织一支革命作战队伍的实际经验，两者都没有设法协调他们的行动。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双方关系中的相互不信任。例如，王天纵自然把进攻洛阳失败的责任推在共和派身上，因为进攻计划是被一位年轻的共和派同谋泄露的。另一方面，根据一种说法，早些时候由“仁义会”参加的进攻开封的失败也是由于共和派不愿信赖这种非正规武装而导致的。（22）辛亥革命以后，在河南的许多地区土匪又重操旧业，这既是生存下去的手段，又是对几个月来的兴奋情绪的取代；共和派选择这个时候来摆脱他们，其刊物再次把这些不愿向新的当局投降的民众英雄称为“盗匪”。（23）命运之轮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处。那些没有被收编的非正规武装，如镇嵩军，不是被共和派出于天真的好意解散，就是被袁世凯强行驱逐，重新为匪。按照政府“凡蓄意滋事，行同土匪者格杀勿论”的命令，有些地方武装遭到屠杀。（24）

在辛亥革命中，共和派与土匪的结盟始终没有超出权宜之计的范围。对土匪本身来说，象王天纵和他的伙伴那样具有明确的使命感的匪酋把起义当作绝好的时机，既可以对蔑视他们的制度复仇，又可以证明他们胜过一般“土匪”。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危机中活跃于豫西南的小股土匪也是如此，他们发觉在革命战争中存在各种可能性。对一些人来说，他们把一切都寄托在这最后一次的努力上，以便重建他们了解的那个世界，他们把自己称作复仇的先锋。对其他一些已经脱离农业生活的人来说，有希望通过官方对他的军事才干的认可而确保在权力的阶梯上得到一个位置。无论是哪种情况，前途都是当个农村的地方英雄，而且迟早会与共和派的带有政治性的实用主义见解发生冲突。象刘春仁和吴沧洲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所激发起来的信任，纯粹是对个人的信任，只要共和派还基本保持旁观者的架势，这种信任就不会扩展到整个革命军队。在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并没有出现改变这种状况的任何迹象。

白朗参加革命

1913年夏天，共和派发动“二次革命”，这场新的武装斗争的目的是从“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但是他们的军事实力和两年前一样软弱无力，他们的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豫鄂边界迅速壮大的白朗农民军。对后者来说，这也是一个提高其威望的理想的机会，而且得到一位强有力的保护人，以取代日益衰败的宗社党。

白朗和共和派之间最早的接触是由国民党驻武汉特使邹永成出面的。根据邹永成事后的回忆，他在和其他国民党人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之后，就和白朗的两位密使见面，然后将他们送回河南，而且交给他们盖印的委任书，任命白朗为“湘鄂豫联军前敌总指挥”。虽然这件事情的时间不很清楚，但是很可能发生在1913年6月中旬，就是在宣布二次革命前的一个月。（25）

如果说这是白朗第一次了解共和派的存在和辛亥革命的意义，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与宗社党有联系，但是前一年冬天他在鄂北群山中已经和“江湖会”有了接触，“江湖会”是当地秘密社团的分支，不仅在传统上与到处寻找藏身之处的河南匪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当地革命者的鼓动之下很快响应武昌起义。尽管白朗实际上是否与这些革命者有过接触，还有待证明，但是他确实为这些社团的起义热情所影响，这似乎是很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他真象一家报纸所声称的是“大刀会”的成员，就更是如此。（26）

白朗和邹永成接触时恰恰是袁世凯从他的间谍那里获悉革命者的计划的时候，袁世凯开始聚集部队南下，企图阻止计划中的起义。对革命者来说，在他们到达长江流域之前，阻止这些军队南下是很必要的，在长江流域聚集着革命者的反军。这时他们决定与白朗联系无疑也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于是邹永成指示两位密使返回河南，试图破坏黄河上的铁路桥。不幸的是他们在放置炸药之前就被逮捕枪杀了。

白朗的人马是否也参加了破坏铁路桥的行动，还不清楚。但是到了7月，邹永成的口信肯定是送到了，他的提议得到了贯彻。虽然北方的大批军队已经顺利运往南方，但是白朗的义军在革命者的计划中的作用仍然是很重要的。诸如随着大批军队的南下势必留下真空地区，可以在这些地区制造骚乱；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占领京汉铁路沿线地区，阻挠军需品和增援军队的通过。在两个月的军事行动中，这项任务他们完成得很成功。（27）他们的作用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必须指出，他们在革命省份的那些都督眼里，只不过是革命的辅助性力量。

不过，共和派很明确地准备尽力确保与白朗的合作关系。象两年前王天纵所收到的信一样，革命党领袖黄兴亲笔写信告诉白朗，夺权后让他出任河南省都督。（28）

与此同时，革命者由于和白朗的联合也替自己找了许多麻烦，白朗是豫南最难对付和最难和解的匪酋之一，又是土豪劣绅的死敌。为了竭力避免上层社会强烈反对白朗最终成为都督，革命者通过长期在河南活动的阎子固的帮助，向各方面疏通以争取对白朗的支持。

辛亥革命后，阎子固曾被任命为豫西临汝县县长，他的一项明确的任务是利用他和当地匪酋的关系，（1910年阎子固曾亲自联系这些匪酋参加起义）组成一支非正规部队，以备不时之需。阎子固的新任务是利用他的上层关系去抚慰当地士绅和政界人物，设法使他们支持白朗当河南都督。虽然这项任务一开始似乎毫无希望，但是1913年初夏，阎子固奉命与白朗进行联系，然后以他自己的名义在豫东边界附近的淮河地区举行起义。革命者希望由于他参加，这次起义可以赢得他们所需要的上层社会的支持。“二次革命”开始以后，阎子固在南京接到最后的指示，然后返回河南，但是在列车即将到达时他被押出列车，与其他九位同谋者一起立即遭到枪决。许多幸存者逃出来参加了白朗的部队，起义遂告失败。

“二次革命”开始以后，官方的恐怖政策迫使许多积极分子从四面八方

投入白朗的队伍。其中的有些人是武昌大屠杀的幸存者，有些人则来自鄂北沙洋，那里的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包括它的组织者季雨霖，据说他是白朗的“好友”）。这年年底，据说沙洋的逃亡者试图率领当地的土匪投到白朗的旗下，一起进攻武汉。（29）

同时，按照袁世凯的命令，河南督军张镇芳在河南全境实行恐怖统治。由于张镇芳得到报告，说河南是“十分同情”反袁运动的，于是在8月颁布了戒严令。为了消灭袁世凯的敌人，张镇芳任命许多心腹出任地方长官，并且授权惩罚土匪可以先斩后奏，几个月中，到处是屠杀。许多流亡者别无选择，只得上山参加白朗的队伍。（30）

这样，由于许多对共和派抱有同情的人的参加，白朗的农民队伍迅速壮大，并且开始呈现独特的政治色彩。同时，从南方派出“无数”的代表与他进行联系，给他带来指示和给养等等。其中大多数代表与白朗接触是通过辛亥革命的积极分子凌钺，他曾是省谘议局的议员，在清洗激进分子时被赶了出来。凌钺本人带着各种问候信件和指示前往白朗处，他受孙中山的委托，通知白朗出任河南都督。（31）据说其他许多共和派特使也和白朗合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孙中山的密使沈先生，沈先生显然受到尊敬，因为从1914年1月起，他被允许参与策划所有主要的军事战略。参加起义的老兵日后回忆沈先生深得人心，但是他们强调，沈先生无权直接发布命令，他只能向白朗提出他认为合适的行动方案。然而，据说白朗手下的小头目则憎恨沈先生对白朗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提议不符合他们的愿望的时候。沈先生的作用纯粹只是在军事方面，而不是在思想方面，据说只有一次听到他使用“革命”这个词，那是在有些人把参加队伍是当“螳匠”的时候。其他特使通常装扮成商人，其目的是运送军需品，尽管在豫南群山密林中是难以找到白朗的。（32）总之，在1913年底，一旦白朗决定采取流动战略，他实际上已经不能得到更多的供给。

因此总的说来，到1913年仲夏时，各种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白朗和反袁世凯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已经得到推进；宣言上已经称白朗为“中华民国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7月间，白朗的部队对豫南的城镇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牵制了政府军，在唐县他们击败了一个团的士兵，随后移兵以人口繁盛著称的禹县。这次行动吸引了大量人员入伍，也带来了大量武器和其他供给。同时，他们还派出一支队伍去奇袭驻守在京汉线上的官兵。一家共和派的报纸声称：“白朗的士兵已经和人民军队携手合作；他们强大而且纪律良好”。另一份报纸也认为：“这些士兵足以使河南赢得独立；今后派兵进攻北京亦非难事。”（33）当时被囚禁的欧洲人质也证明这支部队的：“政治倾向”：有些人希望了解“起义的整个进程”，他们“显然极其尊敬黄兴”。袁世凯对此作出的反应，是悬赏白朗的头颅大洋5千元。（34）

令武昌当局吃惊的是白朗移师南下，进攻鄂北的枣阳，但是从13个被绑架的传教士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震惊和沮丧的：起义已经失败，首领已经弃军遁走（据说白朗已经流露出“明显的困惑”）。因此到了10月初，白朗和他的部下放弃城市，重新北上河南，河南马上又沦为“无法无天”的王国。（35）

不管是否愿意，白朗很快又成为革命运动主要的希望所在，不再仅仅是由正规军主持的“真正的”革命的辅助力量。他也是袁世凯在华北的主要敌人，不管在中国的还是在通商口岸的报刊上，他都是一个新闻人物。袁世凯

吸取了教训，着手发布迅速剿灭白朗的命令；还有张镇芳，他加强了对开封附近的“不良分子”的清洗。许多“不良分子”不甘心坐守待毙，重新蜂拥加入白朗的队伍，并且建议他：“如果你想革命，就必须去南方追随孙中山。”

（36）

此刻，白朗看来已经亲身投入革命事业（大有取河南军政府而代之的野心，或许还不止于此）。根据一个被俘获的副手供认，白朗一直保持着与革命者的接触，包括孙中山和黄兴（虽然两位领袖给他的建议似乎互相抵触）。他有一批受过教育的顾问，包括学生和流亡军人，他们无疑一直给予他压力，使他保持对革命的热情，而且对他进行具体的政治启蒙。白朗通过袭击军械库、吸收退伍士兵和加强地方联系的手段来壮大他的军事实力。（37）再加上民众的大力支持，他成为几十年来当地最强大的部队的首领，使他的自信心大增。最终，在1913年末，白朗决定不理睬他的副手（他们情愿守在“豫西的崇山峻岭中做世面”）（38），带领部队离开当地山区，重新投入革命。以后几个月，白朗和他的部队采用的各种名号，足以显示他已投入反对袁世凯的事业。白朗有时被称为“扶汉军督军和公民司令”，有时被称为“讨袁军司令”，在题有“民国孙总统”的宣言旁边是缀有“大都督白”的旗帜。义军本身被称为“公民讨贼军”或者“公民除匪军”，反袁世凯的使命昭然若揭。偶而有一次义军被称为“讨贼建国军第二路军”，由此可见它与孙中山的关系，因为“建国”是孙中山的著名口号。在进军陕西的途中张贴告示，痛斥袁世凯政府“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称白朗“集各路之英雄，顺天意民心”，志在打倒袁世凯政府。白朗打算一俟准备就绪，马上率军从西北折回，摧毁袁世凯的专制政权，“建立一个完善的政府”。（39）

白朗的流动战略始于1913年年末，也导源于他与革命者的联系。虽然据说他的部下是勉强随他第一次南下安徽的，但是白朗迫使他们追随自己的目的，显然是想投靠南京附近的黄兴。不幸的是黄兴早已逃走，于是，又转而决定向西跋涉去四川，几乎可以肯定，这受到亲孙中山而不是亲黄兴的谋士的怂恿，因为据说白朗对黄兴的“怯懦”，表示“蔑视”（40）。不过，白朗的义军在这一阶段，所受到的共和派的支持多是道义上的。一个在鲁山附近的山区徘徊的密使对农民说，他为白朗带来了一批武器，却找不到他。白朗以前的一位副手声明，白朗的部队从不接受以军火形式的支援，密使没有完成使命，只好回家。另外一些报导，证实了白朗的队伍在这个时期主要依靠偷盗军火、马匹来满足军事需要。（41）

或许在行动的最后阶段，白朗由于不能得到更具体的援助，才决定返回河南，而放弃企图调遣人马从甘肃进入四川。以前白朗可能以从共和派那儿得到物质和军事援助为由，来说服副手们改变巩固河南根据地的自然倾向；而现在在遥远的甘肃，受到敌对的军队和愤怒的民众的夹击，这种努力就不容易实现。当他的部下拒绝继续前进时，他无可奈何地转向他的谋士，沈先生回答得很简单：“如果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走，那么事情只好如此，我们都只能回河南。”（42）到达河南时队伍已经瓦解，这种结局是没有料到的，事实上使共和派措手不及：

当今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最诚挚的愿望是土匪“白狼”

能够成功地扮演墨西哥比利亚那样的角色……他的匪帮给动荡不走的中华民国的安定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他的军事行动得到国民革命组织的支持，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43）

不幸的是，当这种乐观的报导出笼之时，白朗的无头尸体已经在坟墓中腐烂了。

军阀时期，土匪和革命力量之间并不十分有效的联系逐渐结束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见解有分歧。文献记载表明，对于共和派来说，土匪的力量和正规军的作用相比，只不过是辅助性的。

只有当正规军不能接近或者被击败时，共和派才把注意力转向土匪，甚至在那时也不过是暂时的权宜手段，因此土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结果，招募土匪和秘密社团主要是为了充当突击队，或者是作为牵制性的目标，以避免宝贵的正规军受到攻击，幸好这种作用适合他们的天生热情和对现代战争性质的无知。虽然他们对这些目标是有益的，这从未被中国革命者所否定，但是毕竟总会发现更多的事情。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正如一位辛亥革命的老兵所回忆的，“在革命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危险的或冒险的任务都是由哥老会成员完成的。”当我们发现辛亥革命中河南的大多数“革命烈士”都是“仁义会”的成员时，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其他地方的革命战略实际上也是组成“土匪敢死队”，在官兵的阵地上进行自杀性攻击，（44）傲慢的精英人物很少有这样的表现。民众武装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当炮灰。

对土匪来说，他们与革命者联盟是带着一种相当矛盾和实用主义的心理的。作为乡村武装，他们的视野相当狭隘，往往局限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因此，白朗的追随者情愿杀死河南的县长们来反对袁世凯；王天纵的队伍的目标是洛阳，而不是北京；山东“民军”在抢劫完县城后就收拾行李回老家了，他们多次流露出对革命者缺乏信任，白朗对黄兴的态度的骤变就是一例；“大刀会”把进攻洛阳失败归咎于联盟；樊钟秀情愿让“当地英雄”张钫出任“靖国军”司令，而不愿意让“革命英雄”于右任出任。不过，白朗的追随者受到夸大地吹嘘共和派的力量影响，跟着他们的领袖在整个华北到处跑；而白朗和王天纵则是得到获得实际权力的许诺才参加革命的。土匪和其他农村武装始终需要强有力的保护人，当革命者似乎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时，他们就转向革命者。

1917年以后，随着孙中山在广东成立临时护法军政府，革命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南方。而在北方，军队成为获得保护和声望的主要资本。除了在陕西组织靖国军之外，革命者和华北土匪的联系往往采取这样的形式，他们鼓励土匪在反动军阀统治的地区制造混乱。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时进行策应。（45）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最大的麻烦。（46）1927年，甚至在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中主张“集中力量”鼓动开封附近的土匪给军阀当局制造问题。（47）

不论是把土匪当作游击队进行合作，还是在远方对他们进行操纵，这些革命者所使用的方法的实质基本上是相同的：土匪的利用是为了革命者自己的目的——“分散当局的注意力”，“制造麻烦”，“阻止军队调动”，等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命者曾考虑过土匪自身的命运。

土匪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

土匪与共产党之间的早期接触根植于浪漫主义和不信任的气氛中，这是以前打交道的特征。由于共产主义运动自身力量的壮大，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一直保持着，但是浪漫主义的态度逐渐被现实主义所调和。通过残酷的斗争，共产党面对基本的社会变化而提出一个革命纲领，最初他们和土匪联系的目的是对付残酷的环境，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随着革命运动从进攻性地扩展发展为创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他们对土匪的态度变得强硬而成熟。同时，土匪卷入农村革命，使得传统的英雄角色日益显得多余，抢劫生活日趋显得困难，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向迅速变化的现实妥协。

在与土匪接近时，共产党遇到了共和派在 1911 年所遇到的相同问题：当土匪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时，共产党如何有效地体现自己？如何解决土匪的地方性偏见？例如，贺龙使用传统的结拜兄弟的方式来获得土匪的信任，从而使他们站到革命一边来；朱德在 1921 年被土匪抓获，由于他曾经是哥老会的成员，与匪酋同属下层社会，因此死里逃生。（48）

这也是些现实问题。1923 年在广东海丰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由于他们反对当局，制止了属于协会的村庄中偷盗牲畜的风气，周围诸县的土匪把他们称作“宗族之魂”。不久，由于上述的协会和土匪的“共生”现象引起了许多责难，而且由于政府垄断传播媒介，农民协会被认为与土匪没有什么差别。彭湃作为农民协会的主要组织者，被当作企图煽动闹事的“匪酋”而免职。（49）

然而，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很少有时间或机会来考虑公众舆论正确与否。甚至容忍国民党的宣传歪曲事实，以致引起公众对他们的政治纲领的不信任，有些红军的行为很象抢劫的土匪，有些独立的匪帮“借用红军的名称，采用我们的口号”。这种战略决策引起以后的战略家的悔恨的叹息：“大众完全无法理解红军是什么队伍。在很多地方，红军象土匪一样受到攻击。军队没有大众的支援……”（50）

如果说共产党由于与土匪的联系而受到损害，那么他们还是从土匪那里学习到许多战略战术。最明显的教益是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在遥远的边界地区，那里政府的管辖能力最弱，而且往往易守易撤。朱德过去在云南与法国人支持的土匪作战了两年，学会了游击战术，这对他以后为红军制定战略时提供了好处。他也承认，为了抵抗政府军，寻求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有效方法，他与早期盘踞山上的土匪首领王佐和袁文才进行过磋商。他们转而传授一位名叫“老聋猪”的老土匪的建议：“你们不必知道如何作战；你们必须知道的是如何与敌人周旋。”王佐与袁文才就是采用这个保护措施使他们的藏身之地从来没有遭到破坏，尽管他们的追随者只有原始的弓箭和以树干制成的武器。（51）

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也吸收了土匪的战术，他强调在平原上利用高粱地的“青纱帐”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他还指出在河湖地区“呈现的这种海盗或水寇的戏剧性的作战情景，在我们的历史中比比皆是”。（52）然而，毛泽东补充说，这些技术不过是革命战略中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战术而不是一种战略，归根到底，一种战术不能获得革命的变化，除非它作为长期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在共产党与土匪之间的早期合作的背后，是革命军队自身所处的悲惨境地。由于政府军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对主要城市的徒劳的进攻几乎使力量耗尽，华南的共产党不得不寻求湘南土匪首领的援助。由于后者的推荐，他

们能够撤退到湘赣边界的已被王佐和袁文才占领的著名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最初力量薄弱的革命队伍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也被迫寻求那些政府无法围剿的农村地区。不用说，匪帮在这些地区几乎无可争辩的统治持续了几百年。当地的共产党选择这些地区的理由与土匪相同：那就是安全。然而，虽然毛泽东强调，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获得喘息的机会，这些地区是重要的，但是他又指出，长期占据这些地区并不是真正安全的。（53）

虽然土匪具有初步的战斗力量和适合游击战争的战术经验，但是产生和保存地方土匪活动的条件并未构成革命运动的气候。提倡革命运动意味着动员农民参加土地改革和自卫，正如周恩来在1930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土匪对这些目的兴趣不大。（54）而且土地革命常常并不能吸引那些革命根据地的当地居民。由于这些地区与世隔绝，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往往早已存在着以相互依存的默契为基础的相当明确的权力网络。江西山区的土匪和地主在共产党到来之前，可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例如，地主可以交纳一种固定“税”来确保其安全。而政府对走私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此换取回扣和一定程度的安宁。由于近亲繁殖，这些社区往往憎恨外来政治力量试图重组社会关系的干扰，甚至不同阶层的人都可能联合起来进行抵抗。

只要现存的权力结构完整无损，革命者发现要建立自己的武装是很困难的，除非利用物质和资金的支援去争取当地的土匪。然而，这种联盟的本质并不能促进地方安全，土匪往往摇摆于支持红军还是树立自己的地方形象之间，没有农民的支持，这种联盟是不会成功的。即使革命者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也会出现这种趋势，富农与地主一起上山建立自己的匪帮（55）（土匪自身的这种有趣的发展可以称作土匪活动的“资产阶级化”）。

因此总的说来，在开展革命运动的地区不得不在地理上和后勤上依靠现存土匪亚文化所不能提供的手段去发展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潜力要比产生土匪活动的倾向薄弱得多，土匪活动与革命运动不同，它们只要在家乡以外的地区活动就会被默许。正如一位当地共产党组织者所报告的，在农民的心目中，‘如果还存在着土匪活动，不论你带来多少减租的好处都毫无用处。一起绑架案就足够把我毁了。’（56）共产党在河南的成功主要不是在那些贫穷和土匪活动都很普遍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而是在那些新近发展的和衰败的地区，诸如京汉铁路沿线的城镇，那里的地方自卫要比土匪活动更为典型。即便是这种成功也是极其短暂的。（57）

只要各省的边界地区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而且生活费用低廉，他们通常能够抵御协同围剿的企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地区土匪活动只要不公开威胁地方安全，当局长期以来主要采取宽容态度。然而，共产党的到来改变了整个局面。由于受到颠覆思想支持的扩张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政府干涉的主要目标。对共产党来说，面临传播平均主义以鼓舞农民的忠诚的困难日益增加，从而产生了强调军事组织的需要。这使他们无法广泛地动员，不得不对土匪更加依赖。30年代初期的陕西和鄂豫皖苏维埃的东部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和其他被共产党占领的边界地区一样，出现了巩固革命力量的主要障碍，使得毛泽东坚决强调流动的根据地的需要。（58）

陕西革命运动的故事是从3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是一场以抗日战争为中心最终巩固了共产党的领导的革命运动。它的主要发起者是一位年轻的共产

党人刘志丹，他是北伐军的一员老兵，共产党早期创建者之一。1928 年他回到陕西，企图鼓动冯玉祥的国民军战士，后来在陕南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但是很快被冯玉祥镇压了，它的幸存者组成了第一支陕西游击队。从这点来看，刘志丹领导的起义与樊钟秀起义的早期阶段非常相似。埃德加·斯诺把它描述为“受挫、失败、沮丧、逃亡、冒险、死里逃生，象一只万花筒，他是一位时时受人尊敬的复原的军官。”1931 年，刘志丹准备创立陕西第一支共产党军队，并且接管了陕北山区的 2 个县作为根据地。政府军派兵围剿却纷纷倒戈；人们传说刘志丹“刀枪不入”。到 1932 年，革命军队已经占领 11 个县，翌年，陕西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59）

“在华东诸省的普通人民的心目中，”1912 年一位美国观察家写道，“……陕北是野蛮的掠夺者的巢穴；陕南也好不了多少。”（60）因此，在革命运动开始时，刘志丹被迫依靠陕北的土匪亚文化（也许和毛泽东一样，并不都是勉强的），他的主要兵源来自土匪。而且他所采取的战术也和数百年来占据陕西山区的那些非法之徒相一致——打富济贫，突然袭击和迅速转移，队伍的穿插行进。与贺龙、朱德一样，刘志丹自己是哥老会成员之一，哥老会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很强，总是与任何军事目标相关联。即使迟至 1931 年，当军队（600 名士兵只有一半拥有武器）采用“西北反帝联军”的旗号时，据说由于其中土匪占大多数，而不能打起红军的旗号。参加军队的农民开始发泄世代压抑的愤怒，他们杀死地主、收租人和地方官员，绑架富人勒索赎金，他们“剥夺剥夺者”，与土匪非常相象。观察这些行为，要把“游击队”与其他任何匪帮区别开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61）

进行使贫农和无地村民获得好处的土地改革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不进行土地改革有明显的理由，因为政府军或军阀对这些地区的反攻倒算总是迫在眉睫，对于没有防卫能力的贫农由于害怕报复自然退缩不前。于是，共产党提出了他们认为更为紧迫的问题：灾荒导致的饥饿、高捐税、无法摆脱的债务。结果他们不象现代的革命者，而象具有传奇色彩的土匪英雄：从地主那里没收谷子和其他农作物，再把它们分配给穷苦的农民，而他们也不必惧怕报复了。毫无疑问，这种战略很快被西北地区具有传统意识的农民所接受；但是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把农民排除在斗争之外。他们可以坐享其成，而不是积极投入改革社会关系的革命运动中去。与在江西的情况一样，一系列的失败使得根据地从一个边界地区转移到另一个边界地区，由于不能保证军队的安全，陕西共产党被迫遵循一条难于区别于社会土匪的路线。直到 1934 年，当根据地在著名的非法之徒的藏身之地得到巩固时，部队吸收了被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反鸦片运动驱赶出来的土匪而加强。然而这时，共产党的力量有所增强，并且逐步为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而打下基础，它可以给在它控制下的村庄带来安全，在陕西革命运动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动员农民执行激进的计划。（62）1936 年，江西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西，陕北作为革命根据地的作用更加巩固了，1937 年以后它成为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中心。

然而，革命运动的成功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陕西远离主要的政治中心而存在的权力真空状态，而且以当地的传统土匪亚文化为基础。只要具有适当的政治条件，共产党能够逐渐建立过去由土匪叛乱者所建立的传统。从这种情况来看，鄂豫皖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是相当不同的。

鄂豫皖苏维埃政权是由在蒋介石的清剿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军队创造的，它是被迫与土匪亚文化来进行革命运动的又一个例子。“鄂豫皖”是湖